

No 92
27

徐
飏◎著

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

成器之道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青 年 学 者 文 丛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青 年 学 者 文 丛

徐 飏◎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成器之道

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徐飏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2

(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文丛/《南京师范大学青年
学者文丛》编委会主编)

ISBN 7-81047-413-8/J·21

I. 成… II. 徐… III. 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中国
-先秦时代 IV. J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800 号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 210097)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玉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16 字数 214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1047—413—8/J·21

定价:18.00 元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随园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公丕祥

副主任委员：王臻中 屠国华 陈凌孚
朱小蔓 张留芳(常务)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政红	王臻中	公丕祥	刘一平	刘泽纯
朱小蔓	宋永忠	何永康	陆天虹	张纯一
张留芳	杨启亮	杨鑫辉	吴康宁	吴 锦
陈怀惠	陈美林	陈凌孚	李晏墅	周开亚
周志华	范保文	郁贤皓	郁炳隆	俞子正
闫国年	施和金	施国新	钟振振	郝振益
班 华	倪绍祥	尉天池	黄克谅	笪佐领
龚廷泰	屠国华	屠美茹	鲁 洁	蒋伏心
潘百齐	樊文彬			

执行编委：王政红

总 序

公元 1998 年。21 世纪的钟声,已经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踉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我校领导立足于建设教学科研型的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高度,经多次研究决定,汇集本校历史上以及当今知名教授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随园文库》;选择颇见功力的青年教学研究人员力作,编辑出版《青年学者文丛》;资助出版若干本校教师编写的优秀教材。这项举措,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为保证这三个系列图书的出版,由学校和校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其职能机构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办公室”。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由数十位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的《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以保证《随园文库》、《青年学者文丛》这两套丛书的学术质量。教材资助项目,则直接由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把关。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 1902 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成为许多名校之宗。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近百年间,多少学界巨

子,讲坛精英,举师范薪火,耀群星而璀璨,传万姓以燎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江南北,教育事业空前发达起来。处在江苏省师范教育龙头地位、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南京师范大学,越来越显示她巨大的作用和夺目的光彩。历史表明,要振兴教育,尤其是振兴高等教育,绝对要凭借一代又一代的名师硕儒,学术巨擘。否则,即使学校规模再大,也难免空头学府之讥。代表性学者的创造精神和他们的名家风范,对于文化的传播,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学风的垂范,实在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出版他们的著作,虽然是求其学识品行于万一,但对于后学诸子,仍然弥足珍贵。

文库取名“随园”,盖因南京师范大学之老校区,是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院址上扩而大之,其地在南京城内清凉山东,小仓山下,据考证乃清代文学家袁枚“随园”之故地。“随园”早湮灭难考,袁枚在此所著《随园诗话》却久传不衰。青年大学生们常喜以“随园学子”自称。昔日“随园”,亭台楼阁,堪称海内名园之最;今日校舍,雕梁画栋,享有“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誉。可见,“随园”二字,内含多少文化信息!以“随园”来命名这套文库,既发思古之幽情,又达传世之美意,更挟后学之襟怀,岂不善哉!

《青年学者文丛》所收著作,多为本校40岁以下之青年学者的扛鼎之作。他们正负重登山,不上则下。为他们出书,无疑是提供一点促进的助力。他们的著作,也许不如《随园文库》那样圆润周至,精辟老辣,但是他们敢立一家之言,敢树独家之帜,在知识创新的呼声日甚一日的今天,正顺应着时代的方向,代表着学术昌盛的未来。他们是学校学术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新一代的学界巨子,将从他们中间走出来。如果说,南京师范大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风光过,靠的是《随园文库》作者那一批精英;那末,要风光未来的一个世纪,靠的将是这一代青年和他们的承继者!

《随园文库》和《青年学者文丛》要通过多年才能臻于完成。现在采用的是逐年申报,逐步实施的办法。每年申报的选题,经《随

园文库》编辑委员会认真评选、投票表决而确定。出版费用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全额资助或部分资助。从筛选书稿,到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直至印刷包装,均严格按照出版精品的要求来对待,务求使其成为精品。这些书稿凝结着我校几代学者的心血汗水、聪明才智。《随园文库》的作者有的已经作古。为了确保这两套图书得以精品的面貌问世,我们对书稿本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为此,作者或者其亲友传人,在出版图书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许多同志不辞辛劳、精益求精。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辑出版这两套大规模的系列图书,我们尚缺乏经验。选题时间跨度较长,又涉及多种学科,有些书稿又需后人整理,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我们一定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尽可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但是,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肯定还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祈请作者及读者海涵,并不吝赐教。

《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序

张道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是太丰厚了，不论东方或西方都在汲取着她的智慧。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为她的博大雄厚自豪的同时，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即弃之不得，又难以利用。不消说对于治文史者是如此，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也是如此。我们通常说的“继承与创新”，做起来并非易事。如果在大文化中举出艺术一项，再从艺术中举出工艺一项，论学问已经够“小”了，然而认真思考起来仍是不着边际，甚至不知如何下手。做学问的难处在于，一旦方向确定，研究的方法非常重要。古人所用的考据学的方法已不够用，儒生们解经的办法更是钻进了牛角尖；西方的学者虽然方法较活，但却不能直接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美学而论，研究中国美学似乎在先秦诸子之前便无从谈起了，因为没有文献的依据。宗白华先生不愧是一代美学大师，当他思考先秦诸子美学思想的来源时，将视线移到了工艺制作上，由春秋推向了商周时代，结论是“工艺匠师走在了哲学家的前头”。这就为研究工艺和美学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徐飏的博士论文《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便是在这条路上试行的结果。

她是个外秀内刚的人，长期以来养成了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往事。徐飏的大学本科读的是机械

学，毕业后曾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做设计工作，每天伏案画些齿轮和螺丝之类，并且做出了不少成绩。但人各有志，这不是她终生的志愿和希望。她想去探讨有生命的东西，从没有想到“改行”与否，和考虑驾轻就熟的“好处”，便由技术科学一下子跳到了社会科学的顶端，考取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硕士研究生。六年前她通过一位教授来找我，谈了这段历史和她想考艺术博士生时，我也由惊奇陷入了深思。在我认识的人中，跨学科这样大的还未曾见过，而她的思考又是不无道理的。于是在脑海中出现了一种“链反应”：机械学(工艺的)—哲学(思辨的)—艺术学(实体的研究对象)。会不会比单纯懂得一点艺术的人，想得更宽一些，更深一些呢？西方美学不就是哲学思考的结果吗？我决定收她做研究生，并在艺术的理论、知识和鉴赏方面多作些进“补”，果然收效很大。但是她的论文开题比较晚。我强调她应把过去所学的知识穿连起来，在学问面前不应有行当之分。话虽这么说，但若做起来并不容易。她曾为此经过了一番周折，最后才把重点放在了《考工记》。这是一部先秦的科技著作，汉代入将其编入《周礼》，以补“冬官”之阙。两千多年来研究者虽然不少，但多是从儒家的视角，用解经的办法，始终没有发掘出其真正的价值。从现代的眼光看，它不仅是科学技术上最早的一座丰碑，也体现着艺术设计的许多原理。由此引发出来，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工艺制造，透过技术的表面，窥见了当时的造物思想，最终找到了“器”与“道”的关系。

从传统的学问看“道”，只能是“坐而论道”。了夏不是说过吗：“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过去的论者虽说是鄙薄技艺，但实际上是说明个别与一般的

关系，即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只是后来的学者不明了这一层关系，才鄙薄起技艺来。在这一点上，子夏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清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可见，理论的上升，没有实践为基础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把“道”与“器”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不仅能找到两者的逻辑发展关系，而且能够灵活地运用于各行各业的工作中，这样既能增强理论的活力，也能使实践提高。

若干年前我提出了造物艺术论，认为人类的造物活动是区别于动物、也是最发挥人的才智的一种创造，这就是“本元文化”。当人类的文化创造向前推延，分解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时，本元文化并没有被解体，而是与其并行发展，这就是现在所指的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和设计艺术。它兼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双重性，既不是纯精神的活动，也不是纯物质的活动。正因如此，才易于把握艺术发展的轨迹，使艺术理论进入哲学的思考。

徐飏在作这个课题时，我讲了“啃硬骨头”的话。如果能够把这块骨头啃下来，将会对古代的工艺思想做出现代释，可能在有关的范围内产生连锁的反应。这是积极的进取。徐飏走完了第一步，我希望她能继续走下去。人总应往高处走。

1999年11月21日于东大梅庵

前言



器物制造无疑是历时最悠久的人类行为了。它也许还称得上是一件最富于历史性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曾经设想过，比如说，世界上第一件陶器是在哪一些人手里、又是出于怎样的机缘首先烧造出来的，我们今天的陶瓷生产实际上都受惠于人类先祖第一缕智慧之光的照耀。但，恰恰是像陶瓷这样的人造物品，它们的确切起源迄今为止仍然秘不可解。它固持着自己的秘密。在当今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科技时代，这是少数几样还能保有自己神秘性的事情之一。

人造物起源的神秘特性在古人那里被直截了当地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古希腊人认为神是创造万物的本原；中国先贤则说，圣人造物。耐人寻味的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造物活动日益下降为昭然若揭的技术控制的对象和物质性事实，从而不但失落了神圣性，而且还越来越同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相疏离。

器物制造固然是从人类谋取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开始，并且一直同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直接相关，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另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成器活动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超越了单纯求取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线，从而建立起了物品世界和包括人类精神现象在内的生活世界之间彼此呼应的联系。只要想一想人类早期那些丰富的殉葬品就可发现，它们无庸置疑地向人们传达着早期人类关于生死现象种种稚气的然而的确是富于人性的想法。种种祭祀仪式则是把人造物与社会群体共有观念结成一体的一条途径。而在像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更是根深蒂固地按照人群和社会的等级模式组织起物品世界里的等第秩序。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恰好在人造

物那里找到了一个直观的宣泄口和可靠的栖息地，这一事实促使我们突破单纯的物质性层面来看待造物活动，并从它同人生存于其中的完整世界之间的联系当中去对它加以考察和认识。

进一步，那种在造物活动初期就已缔结起来的人造物同生活世界之间的基本相关性一直随着人类造物历史的进程得以延续、演化和发展。应该说，人类在其每一发展阶段的造物无不是该时期技术状况、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和世界观背景等等生活世界中各个因素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现。于今而论，两者间的关联方式已经开展出了它的现代形式，也就是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突然风行起来的所谓“工业设计”。

工业设计连同这个语词本身都是西洋的舶来品。这门学科在西方的形成历史大体上是由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主张连缀而成的——从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到装饰艺术运动再到德国包豪斯等等。只要去考察上述种种运动和主张背后的动机即可发现，所谓工业设计，实际上是欧洲人在新的机器时代里，通过对原有成器经验进行批判、调整与矫正，以谋求建立新时代造物活动和生活世界之间正确的相关方式的产物。但是工业设计发展形成的这个基本动因在它发展成熟之后显然日益遭到了晦蔽。这一点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后来者易于把西方国家的工业设计当作某种类似先进技术手段之类的东西加以引进，反而将本已具有的成器经验连同当前的实际状况一并遗忘。就此而论，本书将要展开的关于先秦成器之历史经验的研究作为厘清本国本源造物经验的一个基础研究，就在纯学术研究之外特别地具有一重现实

的价值和意义。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尽管成器活动有史以来就同人类精神生活发生着广泛的联系，但它的发展历史却表明了它越来越多地由处理物质性事实的技术“文明”所接管，而同那以人类精神为主题的“文化”领域日益隔膜。这一状况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分化和分裂过程的衍生物。后一个过程的起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思想的发源之处。在中国，它以《周易》提出道、器之间的明确界线为标志；在西方，则以柏拉图（或更早一些的巴门尼德）区分意见与真理为开端。中西思想日后的发展都形成了一个不思器物、不思制作的传统，而器物则随同有形迹的和作为感性对象的事物一同逐渐从人类思想的视野中隐失了。

既隐失于思想，它也还必得有隐身之处。那么，它究竟隐向何处？

也许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知识体系的设想能够向我们透露一些消息。

亚里士多德把学术划分为三大门类：理论的学术（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实用的学术（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等）以及制造的学术。理论的学术用来“解惑”，它以无关于实用的“根本原因”和“原理”为标的，是“纯粹理性”的疆域。实用的学术用于探索社会交往关系，是“实践理性”的疆域。制造的学术，其要旨在于通过一定的经验和技艺实现某个具体目的，属于“工具理性”的疆域。简单地说，前两者处理观念内容，后者处理实际内容。亚氏以此把思想的追求与现实的追求分别开来。以中国思想的范畴而言，即是把道（包括大道和各种具体的道在内）的追求和器的追求分别开

来。后一种追求的累积效应就是“技艺”。

由此看来，器首先是隐向了“技艺”。

但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

亚氏所设想的这门制造之学，以今天的知识分类来看，它的内容包括了像医学这样的应用科学、像制作生活日用品之类的手工艺以及像诗歌和雕塑之类的艺术。古希腊人对于制造的理解显然同今人的理解大相径庭。在古希腊人眼里，可以制造的不仅仅是一件有用的物品，也可以是一件观念性作品，甚至还包括一个健康的身体。在他们看来，这三者间的共同性显然超过了差异性，因而可以被统摄在“制作性”的名下。与此相联的技艺概念也就涵容了多方面的内容，可视之为知识、创造性以及判断力完整结合的产物。

但这三者日后的发展使这种情形明显地改观了——迄今为止，应用科学已经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艺术发展成了纯艺术，只有实际物品的制作还残留在制作性领域之内。但物品的制造在今天司空见惯的机器工厂的组织方式下已日益蜕化为单纯的体力付出。与此相应，当今天的人们说到制造时，更多地意味着制造一件物品，并且这种制造还是不费脑力和心力的体力劳动。不难看出，从古希腊到今天，制作性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一再萎缩以至达于某种程度的枯竭的变迁。

这种观念上的变迁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和艺术从制作性中分化并从中脱胎而出的结果。就中国的情形而言，科学技术和艺术也以与西方科技和艺术的发展道路有所区别的方式完成了对制作性的扬弃——它们在近代的发展历程还因同侵略和反侵略的残酷斗争扭结在一起而显得格外沉重和

屈辱。这种分化对于科学技术和艺术来说当然是它们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步骤，但是，对于造物行为及成器活动的根本意义也许至今仍未得到完整的揭示。

不过，人类造物发展的历史已经彰明了如下事实：科技的或知识性的力量日益扩张为成器活动本身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及其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主导性动因，而那曾经直接同人类生活经验相关的成器经验则日益萎缩——那种经验曾经在希腊智慧里表现为造物与神性的联系，在中国智慧里表现为造物与道之间的联系。

眼下，我们关心的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问迫使我们再次去关注人类造物史上的一次突变，那就是现代工业的登场。因为，无论现代工业是否从根本上直接促成了上述转变，它在实际上的确加剧了把造物活动从完整生活世界剥离出来的过程。

现代工业的最近起源是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为这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条件的从 17 世纪以来获得了明显进展的技术革新——它们以一系列可运用于工业生产的新机械的发明为表征。考察 18 世纪以来工业的发展即可看到各工业部门中机械生产方式取代手工方式的清晰脉络。随后到来的时代因而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机器时代。

这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为时不算久长的时代虽然也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样是以物质性的东西来定名的，但其中却包含着某种与以往时代相比显得非常不同的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特别地同人的意志相关。简单说那就是一种试图控制对象的欲望——这个对象可能是大自然，也可能是造物或生产过程；可能是群体的政治主张，也可能是人们对于

生活的一般期望。我们很容易在伽利略的机械论科学观中找到此种控制意识在近代的最初起源，也容易在当代日益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效应当中看出此种控制意识不断强化同时也不断扩展的趋势。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开始步入一个所谓的科技时代，那么最能够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东西也许就是挟裹在一般人意识之中的某种普遍信仰——如今它已经从任何物品都能制造的信仰进一步演变成了能够对于人的心理、精神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加以控制的普遍信仰。这一切都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来达到。同科技突显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支持力量相一致，科技也从根本上决定了造物活动的方式以及它同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完整世界之间的相关方式。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足以让人忘记那漫长的手工造物的历史。

对于今天主要的造物方式而言，手工制造显然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

但是历史和历史性对于我们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获得知识和发展历史感的问题，它还可能是某种塑造我们命运的东西。其中也许包含着并且也将一再地预示着某些人们必然要遭遇到的事情。对造物活动而言，这就是在人的主体性之外的被动性。

在手工造物的年代，它曾经以种种显而易见的限制性规范着人类的造物活动。而在当今这样一个人的主体性远远扬弃了种种限定性因素并且演变为控制意识的科技时代，此种被动性仍然藉着某些更为隐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在场的必然性。从本世纪日趋紧迫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中，我们不难